

资本推手：国际劳工运动的发展与变迁

——解读贝弗里·西尔弗的《劳工的力量》

王荣欣

2003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贝弗里·西尔弗（Beverly J. Silver）的《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一书出版。作者以她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纵横历史的国际视野，使这本著作经历了时间的检验，成为劳工研究领域的必读书目。

对当代世界历史的新奇之处如何进行判断，将决定我们如何评判劳工运动的未来。那些认为劳工运动或将终结的人，往往认为当下这一时期是全新、史无前例的，全球经济的发展进程已经完全重塑了工人阶级和（或）劳工运动在其中运作的领地。相比之下，那些期望重新出现劳工运动的人，则倾向于认为历史资本主义本身具有不断重复出现的动态特征，包括劳工和资本之间持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Silver, 2003: 3, 25）。作者较倾向后一种观点。这本书的目的既不是具体描述某个国家的劳工运动，也不是单独解释某个行业的劳资冲突。而作者自陈此书的核心前提之一，则是要提供给读者一个彻底理解当代劳工运动的动力机制，由此把对劳工运动的理解放在一个时间跨越更长、地域更广的分析框架之中。

西尔弗想回答的问题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劳工运动为什么会堕入低潮？为什么会陷入全球范围的危机？她认为，“在一个经过改良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劳工运动的力量虽然得到调节，但还存在一个尚未解决的僵局注定会导致另一场世界范围的危机”（Silver, 2003: 161）。在这场危机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尚未解决深层矛盾，在表面的平静下预示着更强劲的爆发。

一、劳工运动的历史分析

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来，资方和劳方的劳动其实是一对永恒的矛盾。资

方追求利润，劳方要求保障劳动安全和基本的生活体面。劳工可以罢工，资本也可以“罢工”。20世纪中后期，发达国家的很多资本转移、投资到发展中国家，资本的高度流动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无力维护工人权利。企业一旦被要求履行“社会责任”，资本完全可能转移到其他地区，这就像一场突破底线的赛跑。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夺、吸引资本投资，竞相放宽、降低劳动保障的标准。劳方的谈判能力由此降低，劳工运动进入低潮。

这是解释当前劳工运动陷入危机的一种理论，但西尔弗并不完全赞同这种理论。她在此书中，借助三个章节的篇幅，尝试用世界体系的分析方法来提供一种新的解释。在这三个主体章节里，西尔弗分别借鉴了美国社会学家哈维利（David Harvey）的空间理论和“空间修整”（spatial fix）的概念；运用美国经济学家温伦（Raymond Vernon）的产品周期理论，提出“产品修整”以及“技术修整”；借鉴意大利社会学家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的金融扩张理论，提出“金融修整”，来分析劳工运动。经过三章的扎实奠基之后，作者重彩浓墨地进入对劳工运动的历史和政治分析。

兴起于19世纪40年代的劳工运动，首次使工作阶级（working class）变成了工人阶级（working-class）。但是，随着1848年革命的失败，劳工运动也被镇压下去。1873年至1896年的经济大萧条为劳工运动的发展再次提供了一次契机：各国工人阶级的数量大幅增长，联合国无产阶级的第二国际1889年成立。这一次劳工运动的高潮很难再因受到外力的阻挡而退缩回去。

经济大萧条以后，资本主义迎来了1896年至1914年的“美好年代”。工会、工人阶级政党也同时得到迅猛发展，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壮大和20世纪初英国工党的成立。统治阶级为了消解阶级对抗，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形成跨阶级的联盟。比如扩大选举权，让普通民众也可以参与政治；比如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尽管这些联盟主要使中下阶层受益，但在形式上却实现了全民的保障，西尔弗称其为“国家的社会化”。国家社会化的另一个动因则是为了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动员这些工人（也是公民）参加对外扩张的战争。为了换取工人阶级的忠诚，国家自然要增加他们的权利，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民也由此成为了新的“公民宗教”。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了国家统治阶级实施的跨阶级同盟是很有效的：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战争中支持各自的祖国，导致第二国际彻底瓦解。

一战期间，工会、雇主和政府达成“三方协议”，工会不再罢工，雇主也不再

敌视工会。但三方协议在金属加工行业中最难得以推行。因为“战争工业化”导致军事生产的机械化，直接威胁到技术熟练的工人，所以这些工人都转向了革命阵营。一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匈牙利社会学家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说的“保守的20年代和革命的30年代”。在20世纪20年代，资本家们尚存恢复一战前国际秩序的幻想，尝试恢复金本位，但“自由市场没有被恢复，而自由政府却被牺牲掉了”（Silver, 2003: 143）。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后，各国政府推出各种“救市计划”，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和苏联的五年计划，法西斯主义也粉墨登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增强了工人阶级的谈判能力，因为三方协议持续的时间更长，雇主的让步也更大。更重要的是，劳工运动与民族解放交织在一起。为了争取民众广泛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扩大了动员范围和阶级基础，不再局限于中产阶级。二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但同时也面临声势高涨的强大革命力量。国家的守夜人形象由此被抛弃，福利国家的模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选项。政府尽力保障充分就业，企业保证提高工人实际工资，借此保障工人的消费能力和产品的销售市场。这就是以“大众高消费”为主要内容的美国梦。然而，只有发达国家才可能实现的美国梦，在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alt Rostow）推出了“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引导第三世界的工人们首先要为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而奋斗。

然而，西尔弗告诉读者，大众高消费这一纸“社会契约”是政府和公司所难以公开否定的（Silver, 2003: 162）。美国政府重拾“国家社会化”的老路，大幅增加福利项目，但由于深陷越战泥潭，却适得其反地加速了财政危机。资本也开始“罢工”，选择“用脚投票”，转移到其他地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发达国家的劳工运动开始陷入低迷，随即，发展中国家的劳工运动在90年代以后也转入低潮。

二、劳工研究的方法论

1963年，英国社会学家汤普森出版了其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强调的是共同的体验和文化的因素，并认为当时印刷宣传品的传播也有助于工人阶级达成共同的理念。此外，汤普森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产生是在更早的19世纪30年

代前后，劳工运动也是在这一时期前后产生的，包括大家所熟知的英国宪章运动。

在解释劳工运动时，西尔弗更强调结构过程，而不是文化过程，由此与汤普森分道扬镳（西尔弗，2012：40；Silver，2003：32）。西尔弗所说的结构因素包括地理位置、生产资本的转移等。她认为劳工斗争的模式不可归因于文化因素，例如，她认为，二十世纪的汽车制造工人的劳工运动在各国都非常相似，但这些国家的文化和政治背景却各不相同（Silver，2003：32）。然而，西尔弗在书中使用的是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该数据库是从1870年开始的。由于研究数据的年限限制，她将现代劳工运动的形成定格在1873年至1896年经济大萧条过后的时期。

美国社会学者凯特内尔森（Ira Katznelson）和佐尔伯格（Aristide Zolberg）对汤普森的文化解释也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汤普森的解释维度过于单一，由此提出了研究工人阶级形成的四大维度：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性情倾向；集体行动（Silver，2003：31）。西尔弗也引用了他们的观点，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是指“组织起来的社会阶级，通过运动和组织起来，从而影响社会以及阶级在其中所处的位置”。但是，西尔弗并不分析集体行动的全部方式，而只是关注非规范的冲突，亦即越界行动，也就是还没有制度化的抗争。她认为这些抗争促使资本家或国家进行改革创新，也是理解世界资本主义急剧转型期（例如当下的全球化时期）最为相关的劳工抗争形式（西尔弗，2012：42；Silver，2003：33-34）。

美国社会学家蒂利（Charles Tilly）和麦克亚当（Doug McAdam）等提出解释抗争政治的三大机制，即认知机制、环境机制和关系机制。认知机制研究的是行动者个体对事物的认识，环境机制研究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行动者决策的变化。关系机制研究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注的是行动者和关系是如何产生出来的，行动者内部的构成是怎样的，行动的主张如何扩展到更大的群体（即边界如何扩展）（Kriszky & Mische，2013：16）。西尔弗对此的批评是：蒂利不重视环境机制（比如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在运用关系机制时，又只关注直接关系过程，而忽视了在事件背后发挥重大作用、独立于相关群体和个体认知意识之外的间接关系过程（Silver，2003：31）。而西尔弗的核心方法论前提是：处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工人和工人运动，通过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和政治过程而联系起来，在世界范围内理解不同时空下的“个案”是了解劳工运动动态的关键（Silver，2003：26）。她所称的直接关系过程是指行动者意识到并有意促进个案之间相互关联。直接关系过程包括两种形式：扩散和团结。扩散是指处于不同时空“个案”之下的行动者受到有关其

他运动者行为及其后果的信息传播的影响。团结则是指跨国的社会网络（Silver, 2003: 26 - 27）。

蒂利所忽略的所谓间接关系过程则是指行动者通常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关系链接，它们通过背后的系统过程才联系在一起。这些系统过程包括（针对“系统层面问题”的）一系列行动和反应所带来的意料之外的后果。比如，强大的劳工运动导致资本家将生产转移至新的地点，原先地方的劳工运动会变弱，而这个新地点的劳工运动可能会增强。那么就可以说，这两个劳工运动是通过间接关系联系起来的（Silver, 2003: 27）。

三、劳工运动与四大修整

作者在书中用了四大修整来分析劳工运动：空间修整、产品修整、技术修整和金融修整。这几大修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有可能是在同一个过程中同时起作用。技术修整主要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组织变化，主要是流程创新，比如在汽车制造中大量采用机器人。技术修整与当代的后福特主义可以联系在一起，企业从以往的垂直整合（纵向一体化）转向分包体系（Silver, 2003: 66）。后福特主义削弱了劳工的谈判能力（Silver, 2003: 14）。产品修整则主要和产品的生产周期相关，产品生命周期分为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在产品的创新阶段，劳工抗争最少；随着产品进入成熟阶段，劳工抗争随之增加。

金融修整是与空间修整相关的，而空间修整的概念来自于美国社会学家哈维利，但阿瑞吉和西尔弗对此做了重新演绎。fix 这个词具有两种完全相反的含义，其一是本义上的“固定”；其二是隐喻上的“解决、修复”。由于资本的过度积累，资本为了保证利润率，只能大规模进行流动，比如大量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西尔弗认为劳工运动陷入低潮的根本原因在于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金融修整（Silver, 2003: 165）。金融修整的概念借自阿瑞吉的“金融扩张”。正如阿瑞吉经常引用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话，资本主义一进入金融扩张的阶段，就宣告进入成熟期，这是秋天到了的迹象。按照资本积累的方式，资本主义发展先要经历物质扩张，而金融扩张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束阶段。在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掌权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的正

是金融扩张。秋天是由盛转衰的标志，此时意味着美国霸权已是盛极而衰，走向黄昏。

深受阿瑞吉影响的西尔弗在此书虽然采用了世界体系的分析方法，但对沃勒斯坦（I. Wallerstein）也有所批评。沃勒斯坦强调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平等分配所导致的核心和边缘国家之间不断重复出现的地理差异的过程（Silver, 2003: 29）。相比于发展社会学中的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而言，沃勒斯坦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半边缘的概念。在前两种理论中，这种中间状态是不稳定的，要么是发达国家，要么仍然是不发达国家。阿瑞吉等人曾用数据证明“边缘、半边缘、核心”的三层划分是最能够解释“世界经济”的结构（Arrighi & Drangel, 1986）。它们并非地理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即使一些国家在这三层结构中的位置发生变化（比如从边缘国家变成半边缘国家），但这三层结构仍然是稳固不动的。阿瑞吉在自己后期的研究已较少采用这些概念。西尔弗在此书中用得也不多，谈的较多的是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宗主国和殖民地等。西尔弗对沃勒斯坦的批评是：局部的属性和行为都被当成是某一单位在体系中所处位置的产物。更大的体系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让局部层面的社会关系沿着理论预见的路径进行变化。世界体系理论假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具有系统性和功能性，若用来研究世界各地的劳工运动，则只能提供一幅机械的图景（Silver, 2003: 29 - 30）。

作者在最后总结的第五章分成五个小节，值得注意的是这五个小节的标题后面全部加了问号，也就是说作者对这些观点其实是不赞成的。作者其实是强调金融扩张才是劳工运动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但这正由于此，资本主义的矛盾（利润率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仍然没有办法解决，劳工运动是有希望的。

四、战争与劳工运动

作者在第四章分析了战争与劳工运动的关系。在时间上，劳工运动发生的数量在战争期间明显下降，在战争结束以后，又重新上升。作者是用世界劳工研究小组数据库的数据来证明以上观点的。图示给出两种情况：图1是宗主国的劳工抗争情况，图2是殖民地、半殖民劳工抗争情况。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夕，劳工抗争都在增加，在战争结束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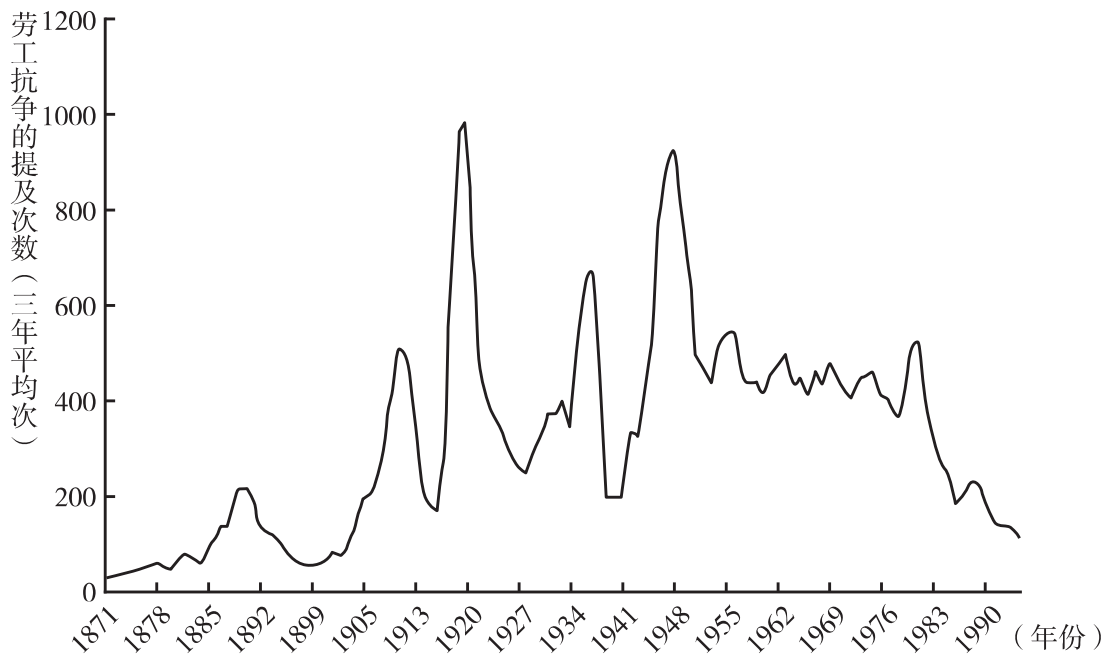


图 1 宗主国国家中的劳工抗争 (1870 - 199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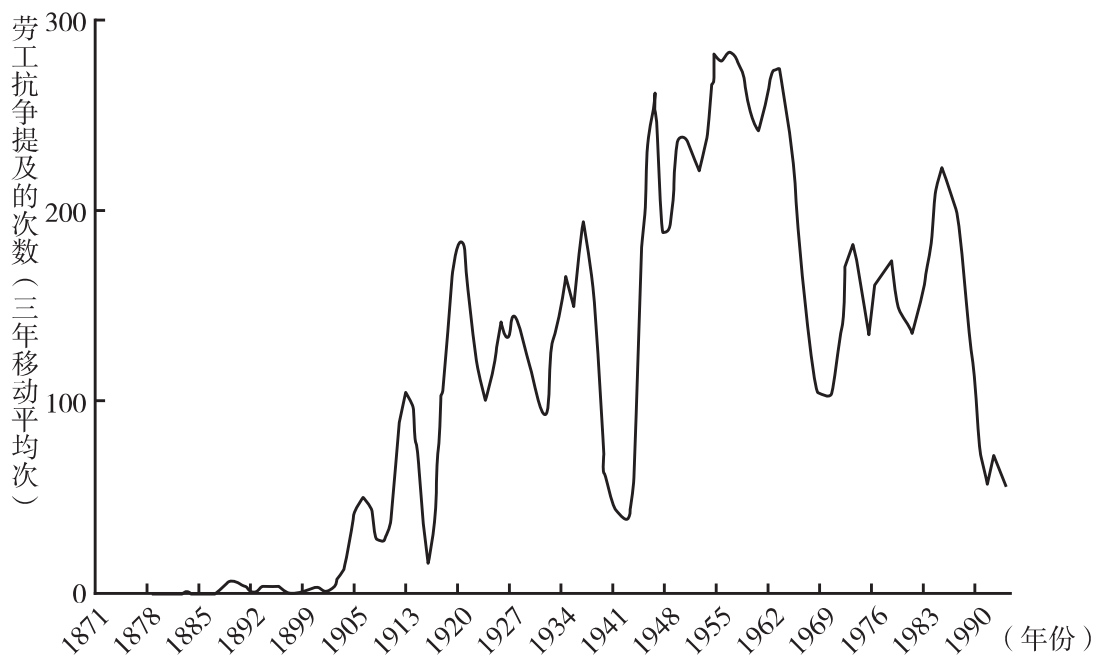


图 2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劳工抗争 (1870 - 1996 年)

又有重大的劳工抗争浪潮兴起。宗主国在一战结束以后的劳动抗争规模要大于二战后的劳工抗争。但殖民地正好相反，二战后的劳工抗争规模大于一战后的，并且持续时间更长 (Silver, 2003: 126 - 128)。

在近代，战争需要有劳工的支持，其中参战人员的一大部分就来自于工人阶级。国家在战争时期需要确保劳工和平，从而确保劳工利益。而在当代，随着军事技术

的进步，战争变得更依赖于军事武器，对战斗人员的依赖降低，所以发达国家发动战争已不必再寻求工人阶级的支持，或确保他们的忠诚。这也是劳工运动陷入低潮的一个原因。

五、劳工运动与政治

关于劳工运动与政治的关系，西尔弗所持的观点是劳工运动并不是单一的运动，必须与其他社会运动一起考查。书中列举了众多这样的例子。20 世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劳工运动促进了旨在实现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的其他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借助劳工运动，使其成为争取经济和社会民主化斗争的一部分（Silver, 2003: 53）。在南非，20 世纪 80 年代下半期，工人运动更能够抵抗政府对反种族隔离活动的镇压。南非工会代表大会（COSATU）发现自身在反种族隔离运动中成为领导力量，这给南非的民族解放运动带来独特的工人阶级视角（Silver, 2003: 60）。韩国 1996 年 12 月到 1997 年 1 月的罢工赢得了工人阶级以外的广泛民众的支持。工人被视为为普通大众的利益而斗争的力量，他们在争取民主的更广泛的斗争中起到了领导作用（Silver, 2003: 64）。正如西班牙、巴西、南非和韩国的事例，汽车工人有可能在扩大和深化民主化的进程上发挥重要作用（Silver: 2003: 73）。

然而在此书中，西尔弗着墨于中国劳工运动的地方并不多，仅有民国时期的纺织工人等几处。对当代中国的分析也仅提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Silver, 2003: 106）。西尔弗在书中做出的预言，“资本走到哪里，劳工运动就走到哪里”，十年以后再回过头来看，其实并不准确，中国的劳工运动正好构成最大的反例。中国是资本转移输入最多的国家，若单从统计数据上看，劳工抗争数量并不多，较为突出的，有 2013 年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前夕，辽宁出租车司机的罢工。但总体而言，劳工抗争的数量和中国资本发展的速度并不成比例。那么，是不是作者的理论就是错误的呢？其实也不尽然，因为中国通过维稳、劳动调解等方式化解了大部分劳工抗争。

那么，能否通过世界体系分析方法来解释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呢？阿里吉（阿瑞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中，其实是通过霸权转移理论，提出了中国崛起的新解释。在 1949 年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确实是一穷二白。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就

是通过五六十年的发展，中国如何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为了回溯历史，阿瑞吉运用的是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分析方法，详述了中国在历史上如何作为朝贡体系的中心，维持了地区和平达三百年之久（从日本侵略朝鲜的1592年壬辰之战到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间）。在历史上，中国所面临的两大任务仅是防范外敌入侵和防止内部叛乱。在当代中国，维稳是解决第二个问题的方式。如果能从大历史的角度，结合阿瑞吉的世界体系分析方法（包括霸权转移理论），重新审视中国劳工运动的现状和未来趋势，将会是一个全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阿里吉 [阿瑞吉]，乔万尼，2009，《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汤普森，爱德华，2001，《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西尔弗，贝弗里，2012，《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张璐、刘建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ilver, Beverly 2003,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rrighi, Giovanni & Jessica Drangel 1986, "The Stratification of the World-Economy: An Exploration of the Semiperipheral Zone."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10.

Krinsky, John & Ann Mische 2013, "Formations and Formalisms: Charles Tilly and the Paradox of the Actor."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9.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彦